

深层生态学文化视域中的《榆树下的欲望》^{*}

孙敏 付美艳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黑龙江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哈尔滨 150100)

提 要:《榆树下的欲望》是奥尼尔的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这个罪恶的欲望故事发生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生态背景下的一个非常美丽的田庄里。以和谐为背景,更能聚焦和彰显欲望的罪恶。然而人与自然的和谐只能是暂时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沙文文化和单纯推进的物质欲望文化必将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必将改变人与自然的平衡,将人推向一条向自然、向人的生命本身无限索取的不归之路。本文从文视角出发,以深层生态文化批评为理论指导,解读文本《榆树下的欲望》。

关键词: 深层生态文化;《榆树下的欲望》;人类中心主义;欲望;和谐

中图分类号: II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0100(2010)03 - 0169 - 4

Analysis of Desire Under the Elms from a Deep Ecological Culture Perspective

Sun Min Fu Mei-yan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Heilongjia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Animal Husbandry and Veterinary Science, Harbin 150100, China)

Desire Under the Elms by American playwright Eugene O'Neill is a great work of realism. It is a story about evil desires, however, the story happened in a harmonious background — a beautiful farm where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get along well. Harmony as the background of the story significantly makes the evil desires focused and magnified. But the harmony and bala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can only be temporal because it will be definitely destroyed by the anthropocentrism and the culture of materialistic desire, which push human beings toward a no-return road to extort limitlessly from both nature and human liv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cultural criticism of deep ecolog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c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play.

Key words: deep ecological culture; *Desire Under the Elms*; anthropocentrism; desire; harmony

在深层生态文化的视域中,人类中心主义的沙文文化和单纯推进的物质欲望文化必将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必将改变人与自然的平衡,将人推向一条向自然、向人的生命本身无限索取的不归之路。美国杰出的戏剧家尤金·奥尼尔的《榆树下的欲望》就生动地诠释了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贪婪的欲望以及这种文化的恶果。

1 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主要表现在人对自然的征服和管制上,这样的理念可以追溯到《圣经》。林恩·怀特指出,“犹太-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White 1996: 15)。《圣经》关于创世纪的传说就已

经确立了人类对自然的管制。上帝告诉诺亚及其子孙,他们是世间一切的主宰,他们要管制走兽、飞鸟、昆虫以及海里的鱼。这就意味着非人类的物种失去了内在的价值,沦为人类生存的工具,它们的价值只能是“为我(人类——引者)性存在”。人类中心主义使人与自然不再平等,使人在整个生态系统中不再仅仅是一个部分而是中心。《榆树下的欲望》中的凯勃特就是一个人类中心主义者,在与自然对峙中没有尊重,只有强势征服。

凯勃特就是赫尔曼·麦尔维尔的《白鲸》中“裴廓德”号船长亚哈精神的再生。亚哈“在自然界面前狂称‘可我不朽的,在海上在陆地都是不朽的!’”(徐明 李欣 2006: 113)。凯勃特则骄傲地宣称,“当你能从这块石头里

* 本文系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生态文学批评——美国文学研究的一片新天地”(11514024)的阶段性成果。

种出庄稼来,上帝就和你同在!”(O'Neill 2002: 419)。亚哈捕杀白鲸,意义已经超出行动本身,它是对人类高于其它生灵的文化观念的固守,是固守中衍生出的一种偏执的仇恨。同样,凯勃特从石头里种出庄稼,也不仅仅是获取财富,而是对清教主义中人对自然界的征服与凌驾的遵循。在清教主义中,劳动是一种美德,清教徒竭力劳作就是颂扬上帝,从中获得的财富则被看成上帝的恩典,然而“上帝是严厉的,不是那么好说话的”(O'Neill 2002: 419)。他告诉人们:“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O'Neill 2002: 419)。这是人在面对严峻的自然环境时昂扬起的征服与凌驾自然的意志,是对《圣经》中人类对自然管辖的旨意在现实中的复写。然而,由于一意孤行,人丧失智慧地将征服自然的行为向极限推进,改写并扭曲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在自然面前巨人化”,使自然“处在被人类征服蹂躏强制的弱势地位”(王岳川 2009a: 40)。

以人为中心的沙文文化使自然在文学叙事中成为“背景”,在现实中成为人类实现自身物质利益的“工具”,成为“为我性存在”。在这样的文化话语中,自然沦为语言符号化的存在,沉默无语,权利被忽视,内在的生态价值被否定。而在人类社会早期,自然“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陈军 2005: 35)。人在自然面前是谦恭的,万物有灵的观念以及对遭天谴的恐惧使人类在自然面前从来不敢轻举妄动。然而,人类在贪婪唆使下、在智慧帮凶下对自然的敬畏到征服,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

在《榆树下的欲望》中,自然中的荒野成为可以任意改造的对象。只要有足够的意志,就可以把它变成“一片热乎乎田野”(O'Neill 2002: 415),成为自己的占有物。一旦自己与占有物之间的占有关系被解除,一旦被占有物的“为我性存在”不再成立,“我会放一把火,看着它烧掉——这幢房子、每一个麦穗、每一棵树,直到最后一根草!”(O'Neill 2002: 416)。深层生态主义认为,“生物圈中的一切存在物都有生存、繁衍和充分体现个体的权利”(雷毅 李小重 2002: 92)。凯勃特占有和放弃荒野的出发点都是“为我性的”,而荒野的“生存、繁衍和充分体现个体的权利”则被忽视了。也许,这一切与人的有用性无关,但与维持自然的完整性有关的内在价值被否定了。西蒙和彼得向往西部荒野的出发点也是“为我性的”。在那张“上面画着一艘扬帆的大船和大写的‘加利福尼亚’几个字”的广告画的日日渗透下,在金子巨大诱惑下,他们的向往不断坚定,最终付诸于行动。凯勃特、西蒙和彼得都是文化歧途中的行路者,他们“痴迷于物质增长而丧失了人性深度和人文厚度”(王岳川 2009a: 40)。

凭借科学技术的力量,人类摆脱了自然的暴虐,这是

进步。然而,当人类的智慧日新月异地幻化为科技的力量,在与自然的较量中不断迫使自然交出它的秘密;当人类从争取生存的生态抗争中,膨胀为瓦解生态系统的罪恶的力量时,也嬗变为人类自毁的力量。人忘记对自然的敬畏,陶醉于对自然的征服之中。人类让江河改道,使山峦让行,不断改写着人化自然,同时也改变自在自然的疆界。曾几何时,美国的西进运动将多少荒野变为良田,同时又有多少飞禽走兽在人迹纷至踏来之时,生命却永远寂寥。自然的完整性在人的自大行为中被蚕食着,虽然自然也在痛苦的修复着,可人类倾听不到它的声音。“人们可以不断地消灭荒野,而又不断地制造人工的自然景观,这无疑是十分荒谬的。人们可以用金钱设计出一个荒野,但这个荒野却失去了荒野的实际内涵,因为荒野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其真实性和原始性。”(雷毅 李小重 2002: 92)

生态批评就是大自然的声音,它的任务就是矫正人与自然的关系,创造人与自然的和谐,不再征服和掠夺自然,而是尊重和爱护。“‘尊重生命’理论,将人的道德范围从有感觉能力的动物扩大到了所有的生命物。”(王岳川 2009a: 38)生态批评的声音不仅是自然的希望,也是人类自身的希望,人与人之间不是征服和掠夺而是尊重和爱。这里包含着真、善、美的文化价值,这是人类一直在寻觅的,却又总是偏离和背弃。“只有将包括自然和精神的整个世界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人类未来终极的前提和最高价值,人类才有可能有效而全面地消除威胁人类存在的生态危机。”(王岳川 2009a: 40)

2 贪婪的欲望

《榆树下的欲望》中的故事发生在19世纪中期。这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时期,是人类在与自然的较量中开始变得强大的时期,也是人类与自然的距离开始变得越来越大的时期,但是当时人类的活动并没有超出地球生物物理的承载能力。“尽管19世纪的工业城市肮脏不堪,它们却具有不容否认的持续能力……它们在大自然能承受的范围内生存着”(威廉·里斯 2006: 52),是人的贪得无厌的卑劣性使生态危机伴随着工业和科技文明一起降生和“成长”。

《榆树下的欲望》中的田庄是一个美丽和谐的生态家园。不幸的是,生活在田庄中的人却欲火中烧。在膨胀的欲望中,人性强烈地扭曲了,征服、占有、奴役、妒忌、仇恨如邪恶的幽灵般在四处舞蹈。在欲望与和谐悖悖并存中凸显出贪婪欲望的罪恶。人类正是在贪欲的引领下一路走来,终于成为地球霸主,成为再也没有天敌的物种,逼近生态崩溃的边缘,人的生存也被置于“人能否管住自己的考问之下。解读历史,人的生存命悬一线,令人感到唏嘘不测。

尼采认为,欲望就是附着在人身上的猛兽,没有约束,它能把人撕碎。的确,“欲望燃烧我们,又毁灭我们”(徐葆耕 2002: 149)。凯勃特已经 76 岁了,是一个占有欲十分强烈的人,他的生命轨迹就是一条重占有轻生存的生存轨迹。他的生命就是用来负载物质的,负载他用石头一块一块垒起的田庄。强烈的占有欲望给了他生存的意义,也赋予他生命的活力。伊本则是一个活生生的小凯勃特,“像他的爹!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他那贪婪的目光似乎要把整个田庄吞下去似的”(O'Neill 2002: 404)。然而在与他的父亲的对峙中,他欲望的满足搁浅了,他生命的活力被挤压。那是“一股凶猛的、被压抑的力量”,被分解为嫉妒和仇恨,将他与凯勃特的父与子的伦理关系扯断。他要占有父亲的田庄,占有父亲的女人。爱碧则长有一张粗俗的肉欲的漂亮脸蛋,她身上的欲望则表现为“骚动、野性和不顾一切的气质”(O'Neill 2002: 407)。她出卖肉体,寻找一个“我的家;为了宣泄性欲,为了最终获得田庄,她勾引伊本,生下一子,却又以“爱情的名义将其杀死在襁褓中。夫与妻、母与子的人伦关系在她不可遏止的欲望中被无耻地僭越了。西蒙和彼得则在对金子无限渴求的欲望中出走,凯勃特的邻居们也都是“一脸贪得无厌的神气”。在剧中最后出现的警察,也是对四周的田庄充满“嫉羨”。美丽的田庄在人们的欲望中无声地存在着,它是否也对今天的生态赤字有所“贡献”呢?

《榆树下的欲望》中的人们都被欲望燃烧着,也被欲望毁灭着。他们的物质享受在欲望中不断升级,而他们的心灵却在欲望中窒息、毁灭。现代社会的腐败和贪婪不正是对此变本加厉的发展和延续吗?“腐败源于整个世界物质主义弥漫的‘有所企求’的贪欲,人们缺乏精神超越维度而处于现实欲望难平的浮躁焦虑中。”(王岳川 2009a: 40)

雅斯贝尔斯说,“人就是精神,而人之为人的处境,就是一种精神的处境。”(雅斯贝尔斯 1992: 3 - 4)《榆树下的欲望》中人物的精神世界漂浮弥漫的全是欲望,真诚和善良的人文价值被驱逐和流放。人的爱的能力已丧失,人的精神生态在仇恨中荒芜恶化,于是“人赤裸裸地暴露在压力、寂寞、空虚的面前”(鲁枢元 2006: 131)。伊本说,“石头上堆石头,不停地垒着石墙——一直到咱们的心也像石头一样冷了、硬了”(O'Neill 2002: 398)。伊本感觉到现代人感觉到的疏离。而可怜的凯勃特“在这个屋里我老是觉得又冷又孤单——即使外面热得要命,里面还是冷”(O'Neill 2002: 415)。他更愿意和牲口呆在一起,因为他们“暖呼呼的”。这不仅让人想起爱德华·阿尔比的《动物园的故事》中杰瑞想与狗交往的努力,契诃夫小说 *Misery* 中的主人公只能向母马倾诉的悲哀,奥尼尔《毛猿》中的扬克要拥抱毛猿的不幸。

当人们把经济与科技界定为人类活动的中心时,人文科学关注的人文关怀边缘化了,贪婪的欲望全线推进,占领人类精神世界的一切阵地。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在原子弹、氢弹毁灭掉人类之前,人类很可能在精神领域已经先毁灭掉自己”(鲁枢元 2006: 22)。当欲望填补人类的一切精神空白,绝对控制了人类的时候,人类就只有不断开疆扩土,不断占有,否则人类的活力无法宣泄。欲望对于人类,无异于鸦片对于人类。

《榆树下的欲望》中的凯勃特、伊本、爱碧只有在占有田庄和对占有田庄的争夺中,才能感觉到生命的力量。他们的生命对欲望已经产生依赖性,吞占物质财富已经成了他们生命中的唯一癖好。他们必须不停地吸食,不停地占有,否则就无法生存。

3 人与自然的和谐

《榆树下的欲望》描写的 19 世纪中期的英格兰还处在工业化的起点,钢筋水泥的世界还没有全面铺开,市场经济还没有全面推进,水深火热的竞争意识还没有全面垄断人的思想。人依然生活在自然之中,依然可以享受一份生命的从容与淡定。在《榆树下的欲望》中,最让人感动的就是伊本、西蒙、彼德和凯勃特不断抬头仰望天空的那份沉醉。伊本“凝视着天空,迷惘而敬畏地叹了口气,情不自禁地赞美起落日的景致来”。西蒙和彼德“默默抬起头来仰望天空,将身子支在锄头柄上。他们脸上有一种压抑、不顺的神气。但当他们仰望天空时,这种表情缓和下来”。凯勃特阴沉的脸色也在“抬头望着天空”时“渐渐缓和下来”,他“伫立在大门口”,抬头“望着天空”,抬头“望着天上闪烁的星星”(O'Neill 2002: 430)。他们对天空的每次举目瞻望都是一幅美丽动人的图画,那是与自然在心灵上的契合。

梭罗说,“自然既适应我们的弱点,也适应我们的长处”。自然可以缓解“过度的紧张和焦虑”(江宁康 2004: 77)。《榆树下的欲望》中的主要人物在欲望炙烤下,人伦尽丧,人际关系紧张。然而由于他们依然生活在自然怀抱之中,其紧张情绪在仰望天空的一刹那得以释放,得以舒缓。因此在他们仰望天空的专注中,依然可以品读到他们良善的人性。是自然疏导他们来源于人际关系的焦虑与压抑,让他们在罪恶的欲望中依然保持敬畏、和缓,而没有像生活在钢筋水泥世界中的后现代人那样冷漠和麻木。然而当奥尼尔笔下的人物出现在 20 世纪初纽约的下等酒吧的时候,出现在《送冰的人来了》中时,他们已经远离自然怀抱,生活在钢筋水泥的世界了。他们打开酒吧的门只能看到川流不息的汽车,他们再也看不到美丽的天空和闪烁的星星,他们的脸上就再也没有令人感动的沉醉和敬畏,他们冷漠,他们麻木。仅仅从精神层面来说,人类就离不开自然。

人要实现与大自然的和谐,就必须放弃奢侈的物质追求。“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增长、物质的需要限制在生态系统可以承受的限度内,追求简单的物质生活和丰富的精神生活。生态文学家认为这是人类应尽的生态责任。”(王诺 2003: 204)今天的人们也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已经陷入“大写的匮乏”的恶性循环中。拼命工作,拼命消费,生命的节奏在高物质消费的一轮又一轮的追加中好似陀螺般越来越快,生命的斑斓色彩在生命的高速运转中消失了。所以近年来西方国家出现“慢生活主义”和“极简生活主义”。他们“把家搬到乡村,自钉木板房,不使用过多电器,挣有限的‘薪水’,充分享受大自然中的空气、阳光”(王岳川 2009b: 44)。就像19世纪生活在瓦尔登湖畔的梭罗,住在木屋里,从事有限的生产活动,其余的时间则用来进行与自然的交流。在《瓦尔登湖》里梭罗反复呼吁:“简单、简单、简单吧!……简单些吧,再简单些吧!”(Thoreau 1971: 91)

《榆树下的欲望》中的田庄的人们由于生产力的局限,物质生活相对简单质朴。他们在简单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没有化肥,没有杀虫剂,没有汽车的废气污染,没有电磁波的干扰,田庄是“旭日映红的天空”下“多好的田庄啊”,只是人们的“嫉羨”的目光给这份和谐掺杂不和谐的音符。那欲望的目光幽灵般地透着冰冷的杀气。田庄的生活是简单的生活,是低物质能量消耗的生活。没有电,照明用的是“牛脂油灯”,没有现代化的住宅,居住的地方是由两棵粗壮的榆树掩映下的简单而结实的农舍,是由深红色的天空和绿荫正浓的榆树衬托下的素色的农舍。没有汽车,出行乘坐马车,西蒙这样描写自己父亲的出行:“一辆崭新的马车,套着一头浑身毛儿梳得整整齐齐、油光发亮的驴子,他挥着鞭子,舌头啪嗒啪嗒地发出响声,驾着车跑了”(O'Neill 2002: 399),出行的时间“是春天,五月份,太阳落山的时候,西天一片金色”。没有挤奶机,是人工挤奶,因此彼德和西蒙说“母牛认咱们,还喜欢咱们”。人的一切活动都依偎在自然怀抱中。这里的自然是温柔的、平和的、充满生机的,人与自然的的关系是和谐的。

4 结束语

“世上有两种简朴,一种是近乎愚昧的简朴,另一种是明智的简朴。智者的生活方式是外在简朴而内涵丰富”(梭罗 2005: 135)。《榆树下的欲望》中的人们只能归类为愚昧的简朴或者一种客观的简朴,但正是在这种简朴中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除了揭示人的无止境的贪婪欲望,奥尼尔也在极力渲染人与自然的和谐,剧中人物在不停地抬头仰望天空,那每一次仰望都是人对回归自

然的渴望;“春天”这个词也在剧中反复出现,它在不断暗示读者,这是一个处处生机勃勃的田庄,这里的自然是健康的;农舍两旁“硕大无朋”的榆树,如果没有被欲望的文化气息沾染,同样表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在这样一个和谐背景下,悲剧的发生以及欲望的罪恶就更加聚焦和彰显,对人类无止境欲望的批判也就更加有力。

参考文献

- 陈军. 生态美学与现代性[J].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05(3).
- 江宁康. 生态文化批评:西部精神和全球意识[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3).
- 雷毅, 李小重. 深层生态学的自然保护观[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1).
- 鲁枢元. 生态批评的空间[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 梭罗. 梭罗日记[M].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5.
- 王诺. 欧美生态文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王岳川. 深层生态学的文化张力与人类价值[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09a(1).
- 王岳川. “后理论时代”的西方文论症候[J]. 文艺研究, 2009b(3).
- 威廉·里斯. 从生态足迹看全球变化、城市的可持续性与潜在的危机[J]. 求是学刊, 2006(4).
- 徐葆耕. 西方文学:心灵的历史[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
- 徐明, 李欣. 论《白鲸》的生态意识[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6).
- 雅斯贝尔斯·卡尔. 当代的精神处境[M]. 北京:三联出版社, 1992.
- 张旭春. 生态法西斯主义:生态批评的尴尬[J]. 外国文学研究, 2007(2).
- Eugene, O'Neill. *Desire Under the Elms*[A]. Shao Jindi & Bai Jinpeng.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C].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2.
- Thoreau, Henry D. *Walden*[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 White, Lynn, Jr.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al Crisis[A]. Cheryll Glotfelty & H. Fromm.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C]. Athens, Georgia: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